

關於「新民主主義」問題^①

我們談一個中國特有的問題。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6.4」之後，北京某工廠為了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北京某單位舉行時事政治測驗，有一道題，是要求回答中國的國旗——「五星紅旗」的含義。想不到這成了一個了不得的難題，許多人回答不出來，作出的回答又幾乎全都錯了；大多數的答案是：中間的大星星，代表黨中央，周圍四顆小星星，代表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據筆者接觸所知，不僅是工廠職工，很多大學生、知識分子、共產黨員、甚至黨政官員和研究社會科學的人員，都不清楚五星紅旗的含義。共產黨歷來很重視對人民進行政治思想教育，落得如此結果，實在叫人驚詫莫名。

不過，這件怪事，其實也不怪。

從小處看，共產黨雖然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但是教育的內容，卻太短期行為了。政治教育的重點，不注重政治的基礎知識，而始終放在當前的時事政策與政治運動。比如，讓中小學生學習什麼中央全會公報，豈

① 1990年春夏的一段時間，筆者集中地思考過同中國改革有關的一些問題，將思考的問題寫下一些文字，湊成25條，有近十萬字。1990年6月寫後自存。此文是其中的最後一部分——第25條。

不是對牛彈琴？「文革」時，竟然把「九屆二中全會公報」列入中小學課本，試想，那些隱晦曲折的語言背後影射的政治權術，當時連許多黨的高級幹部都稀裡糊塗、莫名其妙，我們的國家卻叫小孩子去讀這樣的東西，他們怎麼能夠明白呢？自然，祇能死記硬背，產生逆反心理，效果適得其反。

從大處說，中國政治的變化也實在太快了，大概是由於中國這個昔日的天朝大國，百年來老是落後挨打，所以追趕世界歷史進步的心情格外急迫吧。毛澤東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大概以為，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領域，變革越頻繁越徹底，就越能加速社會進步。因此他不斷地發動一場又一場的「革命」，在革命的任務已經完成，既不存在革命危機，社會也沒有革命要求的時候，仍然要「繼續革命」。因此，在中國的黨和人民的政治觀念裡，革命成了一種「拜物教」，以至後來的「革命」，不斷否定前面革命的成果。

林彪在文化革命時說的一句話十分典型：「現在的革命，就是要革我們過去革過的那個命的命」。把「革命」搞成這麼個「革」法，就難免把人民的思想「革」糊塗了。所以，大概就像「狗熊掰棒子」一樣，老百姓的政治知識，一路學著，又一路丟著。建國初年的事，自然早就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實際上，五星紅旗作為我們的國旗，是建國時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以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名義決定的。它的政治含義是：

中間一顆大星星，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周圍四顆小星星，分別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五星紅旗，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標誌，它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和進程，也代表著這場革命所建立的人民共和國的「國體」。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組成同盟軍，組成統一戰線，共同奮鬥而取得勝利的。當時的說法，叫「四路縱隊並肩前進」。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所建立的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這就是我們國家的「國體」。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這個「國體」的政治形式。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他對中國革命的傑出貢獻。關於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形態，他是這樣論述的：

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經濟成份。這些構成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

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它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

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於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後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的成份，都應當允許其存在和發展。

毛澤東這些話說的多麼好啊。那時候，他雖然也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但他對中國的經濟落後，頭腦是清醒的。

按說，一個國家國體的確立，是非常嚴肅甚至是十分神聖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卻生就一位詩人和哲學家的氣質，在他看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制定的「共同綱領」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憲法，祇不過記錄了他「萬里長征」式的革命的階段性成果而已，祇是些具有表面價值的東西，他的辯證哲學的眼睛關注的，是社會的動態發展和歷史實質的藍圖，而這些，又加進了他詩人的浪漫氣質。但是，他卻忽視了生產力發展這個決定社會進步的更為基本的因素，不幸的是，關於經濟的知識，又恰恰是他並非貧乏的知識結構中比較薄弱的一個方面。毛澤東所追求的社會進步，似乎帶有某種虛幻的成份。

建國以後，「四路縱隊並肩前進」的局面沒有維持多久，毛澤東駁斥了劉少奇「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論點，急不可耐地開始了社會主義改造。這是一場經濟基礎的變革，我們後來稱為「社會主義革命」，也叫「三大改造」：

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將個體農民，變成集體經濟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而變成「人民公社」；

手工業改造，將城鎮的個體手工業和個體商業、服務業，變成集體所有制的「手工業合作社」企業；

工商業改造，將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變成「公私合營」的企業，進而變成國營企業。

「三大改造」，並不是毛澤東的創造，它的理論，來自馬克思關於未來社會的藍圖，模式是從斯大林的蘇聯搬來的。不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尤其是農業集體化，沒有像蘇聯那樣搞得連續多年農業大減產，而是農業生產持續增長，這是一個奇蹟，應該歸功於共產黨崇高的威望、強大的

組織力和精細的政策指導。

「三大改造」的完成，標誌著中國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的結束，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尚未被人民熟悉，就已經變了樣了。如果我們從五星紅旗的政治涵義看：

國旗上的五顆星裡，有兩顆——「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應該被抹去了，這時的國旗，就該改為三顆星星才對。而且，「農民」成了「社員」，代表「農民」的那顆星的含義，也與當年的初衷有所不同。這個變化，在人民共和國建立不到十年的時候，就完成了。

生產關係方面的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進行了錯誤的「反右鬥爭」，鞏固了這個勝利。在經歷了「大躍進」和「公社化」的錯誤和挫折之後，他更加把社會主義革命由經濟戰線，轉向政治和思想戰線，轉向上層建築領域。到了「文化大革命」，豈止是「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命」，連過去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命」也一古腦兒地都給「革」了，以至「革」到共產黨自己頭上，揪「黨內走資派」，革「黨內資產階級」的命。

在進行這種社會主義革命的每一場具體鬥爭時，共產黨都要向人民輸一些新的道理，並且宣稱祇有這次講的道理，才是完全正確的道理，從來不肯溫習一下過去告訴人民的道理。在經歷了幾十年這樣的「革命」之後，中國人民的政治觀念，大概祇剩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以及它們之間的「鬥爭」這樣一些概念了，哪裡還會想到我們的國旗上，竟然還會有什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早已屬於敵對範疇的東西的地位呢？共產黨已經有幾十年沒有向人民講過這些了。

所以，人民不知道自己國家的國旗的含義，其實是一點

兒也不奇怪的。受毛澤東的影響，在中國人民腦海裡的政治觀念，從來沒有把什麼「憲法」、「國體」以及國旗的含義視為神聖的東西。到了「文革」時代，對中國人民來說，大概唯一神聖的，祇有毛澤東本人了。那個時候，如果把我們的國旗由五星紅旗換成蘇聯的鐮刀錘頭模樣，雖然有人可能大驚小怪、也許不會被接受，可是卻相當言之成理，因為它更為確切地代表了現實中國的「國體」：——工人和農民的國家嘛。

中國像個萬花筒，瞬息之間，又變了一副模樣。在經過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的30年社會主義革命之後，中國進入了改革時代。新的改革時代，使我們興奮，也使我們迷惑。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許多新奇事物，聽到了許多過去聞所未聞的道理，我們醒悟了。但是，我們原來熟悉的似乎十分清楚的問題，卻又糊塗了。十年改革帶來經濟發展的突出成績，國內外有目共睹，不必說了。我們要考察的，是中國的經濟基礎即生產關係在十年改革中的變化。

在農村，實行所謂「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制」以後，農村的所謂「集體經濟」，除了鄉鎮企業之外，在農業生產的範圍裡，基本是名存實亡。作為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仍屬公有，但由家庭經營。其它生產資料如農具等，則為私有。人民公社解體了，「社員」重新變成「農民」了。中國民謠說的「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是過甚其詞了，土改的成果並沒有消失。但是，如果說農村的經濟關係，回到了農業集體化之前的情況，則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

在城市，個體手工業、商業、服務業又恢復了，共產黨發號召，威力大得很，有一段時間，他們甚至連稅也不用繳。短時間裡，迅速發展到一千多萬戶、四千多萬人，遠遠

超過「三大改造」之前的規模。中國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又回來了，雖然已經不是原來那些人了。

個體農民和城市個體工商戶的存在和發展，又分泌出新的經濟成份。經營規模的擴大，其中的一部分產生僱工的要求，有人更直接從貸款開始，興辦私人企業。私有企業的發展速度十分可觀，這種新的經濟成份是什麼性質呢？毫無疑問，這就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在「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之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也緊跟著重新出現了。當然，同樣是換了一批年輕的面孔。

有位當年的老工商業者即早已「金盆洗手」的資本家，如今已經賦閒安排在人大、政協了，他在基層視察、參觀如今的私人企業之後說：「這和我們當初的搞法，完全沒有區別嘛。」

從黨的會議到市井坊間，人們議論的話題，從「萬元戶」轉變為「百萬富翁」，僅僅是幾年間的事。中國新的民族資產階級的重新產生，同當初消滅它所用的時間，一樣短暫。資本主義經濟，目前在整個國民經濟所佔的比重，雖然還遠未達到工商業改造前的水平，但其規模已經比那時大的多了。不過，你如果相信統計數字上的1~2%，也要上當，經濟理論界研究「溫洲模式」以後發現，許多私人企業，戴上「紅帽子」，掩蓋在其它經濟成份裡了。

使人不解的是，對這種經濟成份，共產黨雖然允許它存在和發展，卻不堂堂正正地說，這就是資本主義，而是羞羞答答地稱之為「私人經濟」。有位經濟學家，還很著名，竟然著書立說，堂而皇之地論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僱工不是剝削！他的用意，是以否認它是資本主義，來為它的存在辯護，這可以理解；可是，他的觀點，已使他成為中國新生資產階級的理論上的代表，卻也要搶一頂「紅帽子」戴上。

明明是資本主義，卻硬要說成是社會主義。這倒很像馬

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裡引的一句話：「可憐的狗呵，人家把你們當人看哪！」連中國的「經濟學之父」，我們的陳雲同志也不甘寂寞，尋章摘句，引經據典，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找到「八個人以下的僱工，不是剝削」、因而不是資本主義的理論依據。有人更發出奇想，說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是「以外促內」。中國的經濟理論，真可謂怪論百出，蔚為奇觀，使人忍俊不禁，啼笑皆非。人稱「混亂的經濟學」，然也。

至於數以萬計的三資企業，當然是資本主義性質，不過不是國內的中國人所為，分析中國政治，可以不加考慮。

十年改革，中國的變化是深刻的，如果略去複雜情況的具體差別，祇大致就其性質而言：先是「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繼而是「民族資產階級」，都重新出現了；因此，中國的「國體」，又回到了「三大改造」之前的「共同綱領」時期，恢復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形態，五星紅旗，現在有了它的實際內容了。五星紅旗重新昇起來了，雖然它在形式上從來沒有降下過。

但是，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卻仍然堅持稱為社會主義制度，而沒有恢復新民主主義的名義。——意識形態的革命，要保持它的歷史慣性。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改革的決策，是正確的，對改革戰略的選擇，也是對的，在他領導下，中國在十年內，取得了突破性進展，經濟改革的理論探索，也多有建樹。可是，鄧小平卻沒有給他為中國改革設計的藍圖起一個正確的名字，對這個有關「國體」的問題——一個涵蓋一切的超級理論問題，顯然未曾顧及。這可能與他歷來比較注重實幹、不大注意研究理論問題有關。或者，他務領袖之實卻不要領袖之名的做法，也出於類似的思維方式。

然而，這個被鄧小平忽略而未及垂顧的問題，卻不是一個小問題，不是一個戰術性的問題，作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這是一個戰略性的疏漏。

中國歷來有「名正言順」的講究，古代賢哲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鄧小平因為不願當「名正言順」的領袖，在「6.4」的時候吃了大虧。

但是，這裡是國家的「名正言順」，比鄧小平個人的「名正言順」，事情要大的多。中國的現實，已有新民主主義之實，不去「循實正名」，卻在那裡堅持社會主義的名分，不僅名不副實，而且「名實相怨」，必然造成理論的混亂，進而導致廣大幹部和群眾的思想混亂。

現實的中國，因無新民主主義之名，則難以「循名責實」，鞏固和發展改革的成果，實不副名，又勢必產生改革實踐的混亂和衝突，政策的波動和反復，阻礙了改革的進程。

鄧小平也不是不講理論，他對改革在理論上的概括，叫「兩個基本點」，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不過，對這個理論概括，我們實在不敢恭維，因為確實並不高明：斯文點說，這是一種「二元的理論」；通俗點說，這是一個分裂的理論。因為這「兩個基本點」，兩者實際上是互相矛盾的，又沒有一個更高的概括，將兩者包容。

黨內曾有一種意見認為：按照毛澤東「兩點論的重點論」的哲學思想，兩個基本點，應該有重點，以「四項基本原則」為主。但是，這又勢必把改革納入「計劃經濟為主」的「主輔論」軌道即陳雲的軌道，使改革失去勢頭。應該說，這種意見也不算高明，因為沒有反映中國的現實，也不符合中國改革的需要。因此被鄧小平否決了。

理論的分裂，現實生活中兩個基本點的分裂、對峙和劇烈衝突，問題反映到中央，犧牲了一個總書記胡耀邦。後來，趙紫陽在 13 大加以修正，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個基本點有了一個更高的概括，「一個中心」即「經濟建設為中心」。對這個新的概括，鄧小平十分欣賞，13 大將它定為改革時期黨的基本路線。

但是，祇要我們稍加審視，這個理論概括，同樣經不起推敲：共產黨是政治組織，黨的基本路線是政治路線；政治當然是反映經濟的，但經濟並不能代替政治。把「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黨的基本路線，共產黨豈不成了一個大公司？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這樣的。西方的民主政體，反映了它的市場經濟，但並不意味著：政府官員可以做買賣，政府就是大公司。這個概括，顯然缺乏馬克思歷史唯物論關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基本原理的理論修養。而且，這種理論概括，仍然不能使現實生活中兩個基本點的分裂狀態歸於統一。

結果，繼胡耀邦之後的總書記趙紫陽，重蹈覆轍，同樣犧牲在兩個基本點的對峙與夾擊之中。趙紫陽對「兩個基本點」用加上「一個中心」的辦法所進行的新概括，不僅仍然沒有解決中國改革的理論問題，甚至沒有能救得了他自己。

當然，胡耀邦和趙紫陽的事件，因素很複雜，這裡祇是理論角度的分析。中國人的怪話多得很：「上面亂動，下面怎能不動亂？」這大概是指 1988 年的「四季歌」說的。理論問題，是更大的問題，解決得不好，不僅影響改革的健康發展，也是造成社會與政治不安定的更深刻的原因。

鄧小平大概也不會沒有覺察到兩個基本點的矛盾，為了緩和兩者的矛盾，使兩者能夠相容，他想出的辦法是：

一是修改社會主義的定義，幾經變動，最後的說法是，

「以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應當說，這個話很通俗、很大眾化，也很受歡迎，不過似乎有點不大像是個理論；

二是把社會主義降低為「初級階段」，這也是趙紫陽為他出的主意。其用意一目了然，目的是擴大社會主義的「容量」，使改革開放產生的新事物能夠裝進去。但是，還是沒有解決問題，難辦的是，如何處理改革產生的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它的存在是客觀現實。人們的一般心理，祇要這個國家稱為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合法性，總有點值得懷疑；而人們的一般常識，也很把資本家同社會主義理解為一樣的東西。

打個不雅的比喻：在當今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大概好比一個外室或者情婦，一個像《紅樓夢》裡尤二姐那樣的角色，儘管已為共產黨所接納、甚至偏愛，但畢竟不是明媒正娶、不是明正言順、不為正統觀念所承認，對她在這個國家的存在，連她自己也感覺有點不大對頭。比如，這種經濟成份在經濟中所佔比重如此之小，但現在強調的卻是「公有制為主體」。——我們在這裡感到的，不是發展經濟合理要求的反映，而是標榜正統的輿論壓力。

因此，一有政治風波，她就難免受到指責、打擊，政策波動反復，問題不僅在中央，也在社會上：人們可以一面品嚐著改革的果實，一面卻詛咒「百萬富翁」。——至於百萬之數，並不是消費資金，而是生產資本，而百萬的生產資本，根本微不足道，則不願去分辯，這種心態，不是吉兆。

看過《紅樓夢》的人該知道，尤二姐是怎麼死的。這些小老闆們，為了生存，改頭換面，花錢買「紅帽子」，為了發展，行賄拉攏、腐蝕國家官員，一面苦心經營，一面戰戰兢兢。儘管共產黨對改革開放三令五申，許多人還是擔心政策會變，於是一反創業的節儉，蓋房、修墳、擺闊、高消

費，不願投資擴大再生產，害怕有朝一日被「共產」。沒有長期打算，撈一把就走的心理，相當普遍。

這種情況，不僅影響經濟發展，而且造成社會心理失衡。現實的中國，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生機勃勃的景象，一方面卻是世界末日心態。世象百態，撲朔迷離。對於研究社會科學，這是一片沃土，各種各樣的「草」和「苗」，長得繁茂蕪雜。政治家和改革的戰略家，該從中悟出些什麼呢？

這種社會現象，如果影響所及，僅是這一部份經濟，眼下似乎也無關大局，它畢竟還祇佔很小比例。深一層看，中國目前的經濟現象，煞是奇特，一方面市場疲軟、銷售不暢，一方面儲蓄存款加手頭持幣卻達七千億；一方面是生產資金緊缺，一方面沉澱資金大量閒置，一旦溢出，市場便會被沖垮，政府為之膽戰心驚。

為什麼不能把消費資金轉化為生產資金？

為什麼巨大的生產潛力反而成為棘手的經濟難題？

我們可以把問題分析得很複雜，用各種經濟學理論寫出許多論文著作，也可以說得很簡單：消費資金轉化為生產資金，也就是貨幣轉化為資本，這不就是資本主義嗎？——可是，我們的國家和人民，現在還沒有接受這種原則和道理。

中國改革到了今天，經濟問題千纏百結，剪不斷，理還亂。

治理整頓，深化改革，恰如李白的《行路難》，「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進退失據，必將陷入泥潭。

政治上遇到「6.4」風波，改革出現停頓反復，「屋漏恰逢連陰雨，行船偏遇頂頭風」，國際上聲討制裁，糾纏不休，難以緩解。

全國上下，興奮熱烈的情緒為之一掃，陷於沉悶中。

「多歧路，今安在？」

有人仍在打政治多元化的主意，但空談「自由」「民主」，於事何補？亂了套，搞成蘇聯那個樣子，可能更糟。

討論什麼「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遷就一時，拐彎抹角，也未必能出什麼善策。

指望西方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或者從他們的學問和價值觀中，能提供什麼現成的靈丹妙藥，怕是枉然，他們哪有這種經驗呢？而且如今也不來了。

況且，他們推行的「超越遏制戰略」，也使人感覺居心叵測。

鄧小平注重實幹，但改革打開局面之後，千頭萬緒，總得有個章法，不然，怎麼幹？前後矛盾，上下制約，左右衝突，忙也是瞎忙，力量都消耗了。

「山重水複疑無路」，我們還是從自己的歷史經驗中找辦法吧。

毛澤東有句話：「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雖然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把「綱」搞得不對頭，但「綱」還是應該有的。不然，千纏百結的「目」，怎麼能理出個頭緒？

「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

當我們跳出「三界五行」各種令人頭痛的具體問題的糾纏，「背負青天朝下看」中國這個「人間城郭」的時候，我們發現：無論是「經濟改革」、「計劃市場」，還是「自由」、「民主」、「人權」，以及胡耀邦事件，還有趙紫陽與「6.4風波」……，都和那個該死的「資本主義」有關係。

看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地位這樣一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

如何解決呢？毛澤東的興無滅資，掃地出門，連尾巴也

要割個乾淨，這已經試過，顯然不行。鄧小平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弄來個尤二姐，有實無名，她自己活受罪，全家也搞得雞飛狗跳，不得安寧，長此以往，也不是個辦法。

資本主義猶如一個美女，是妖是豔，各人眼光不同。不過，既然她在中國已是客觀存在，我們似乎也離不開她，不如索性明媒正娶，搞個名正言順，她有了正當的名分，也就會規矩些，不必幽會偷情，敗壞倫理綱常。

可是，在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綱紀」下，許多人還是「美女禍水」、「哲婦傾國」之類的觀念，公然接納資本主義，顯然難於做到這一點。不過，我們用不著煞費苦心地再去探討和創造，也不必學個陳世美，喜新厭舊，棄東取西，丟掉原來的社會主義，搞個全盤西化。

這個「綱」是現成的，我們過去曾在這個「綱」下面生活過，雖然時間短些，但日子過得不錯，這就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在中國的合法地位，雖有共產黨三令五申的政策，總是解決得不好。這是因為，所有制問題，不是個政策問題，而是「國體」問題。祇有把問題提高到「國體」的層次上，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在中國的合法地位才能真正解決。看來，毛澤東的遺產，不僅有固定資產，還有「浮財」可挖呢。

是不是中國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呢？當然不是，說得很清楚，是新民主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的「綱」中，仍然有社會主義，而且是主體。溫良敦厚端莊淑賢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我們共過患難，在國家危急時，它仍然會是「頂樑柱」，我們不會拋棄它。以我們落後的經濟，單薄的國力，如果不由國家集中相當一部分，完全實行資本主義，僅國防工業就勢難維持，這是道理之一。

恢復新民主主義的國體，重新走回頭路，現在有這個必

要嗎？這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們來看看，抓住這個「綱」，可以張起一些什麼樣的「目」，解決一些什麼問題。

新民主主義這個「綱」的作用，不僅在於使業已存在尚屬弱小的資本主義經濟成份能夠健康成長，以更多地發揮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而且可以使資本主義作為一般的觀念得到合法承認和客觀對待。這就為改革開放理論和實踐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消除意識形態壁障。

過去，由於東西方對峙，加上長期宣傳的效果，在我們的頭腦裡，資本主義完全屬於敵對的觀念，是洪水猛獸。其實何嘗如此呢？馬克思就論述過它對人類社會的歷史進步的巨大貢獻，這種作用現在看來並未過時，對中國更是如此。資本主義當然不是什麼至善至美的東西，不過至善至美的東西恐怕祇有到上帝的「伊甸園」和中國神話的「天堂」裡去找，現實世界又哪裡有呢？我們今天需要的是追趕列強、經濟崛起，並不一定非得至善至美不可。

資本主義當然有剝削，但社會主義的人民就能把「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都拿去嗎？簡單點說，所謂資本主義，就是貨幣轉化為資本，從而生出利潤；而所謂社會主義，不過是把貨幣轉變為資本的過程完全控制在國家手裡，不准人民手中的貨幣轉化為資本而已。資本主義社會的利潤屬於資本家，但可以想辦法用經濟政策調節限制個人消費，使大部分仍投入生產；社會主義社會的利潤屬於國家，卻因為供養龐大的經濟機器，雖然多了一些倫理價值，但經濟發展的成績卻要稍遜一籌。這十來年，有些人又把資本主義看成一朵花，當作發展經濟的靈丹妙藥，但完全那樣搞也不行，人家做得好，我們未必學得了，時移事易，先發後發，是不同的。我們何不兼收並蓄，各取其長呢？改革開放，外國資本進來了，民族資本也產生了，我們還引進了許多西方經濟學的原理，這不是別人強加的，而是我們的自覺選擇，但歷史

的慣性作怪，硬是不承認這就是資本主義，以致生出許多糾紛，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髒嗎？有了新民主主義，這個問題可以解決了。

消除了意識形態壁障，就可以敞開說話了，這將帶來經濟改革的理論和實踐的許多新的突破。這些年，中國經濟理論界，為了躲開意識形態壁障，兜圈子，繞彎子，有話不敢直說，迂迴曲折，生出許多莫名其妙的名詞、術語、概念、範疇。即使有真知灼見，也如霧裡看花，若隱若現，模模糊糊，使人不得要領。有些虛玄怪異之論，連作者都不知所云，也要濫竽充數，明眼人知道，這是弄職稱的敲門磚而已。這種狀況，於國何益，該結束了。

中國的經濟改革，規模如此宏大，如此頭緒萬千，連西方也沒有這樣的學問，但核心是一個市場，沒有價格槓桿的基礎，財政、信貸槓桿的作用是扭曲的。工廠還沒有成為企業，討論銀行企業化，豈不是隔梯子上房？宏觀控制，經濟手段，總需求政策，產業政策，這些都是對一個市場而言的，離開市場談論這些，就成一盆漿糊。經濟結構也是市場問題。「諸侯經濟」則是市場的統一問題。

但是市場的深層，是所有制結構。沒有多種經濟成份的適當比例，離開這個基礎，要搞出個市場，怕是枉然，空論而已。布魯斯、蘭格、錫克一班人的學問，都未曾有成功的實踐，靠不住。祇有具備多種經濟成份達到適當比例這樣一個基礎，才有可能把國有企業推到市場中去運行，實現所謂「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目標。

而新民主主義所論述的經濟形態，主要內容就是所有制結構。有了新民主主義，我們討論了多年的產權問題、股份制問題、以及企業競爭的公平環境、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等問題，在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基礎上，就會比較容易理出個頭緒來。如，實行多種經濟成份的統一稅制，把中央與地方

「分權」變成「分產」等。這些問題的討論，之所以幾起幾落，始終走不出試點階段，在死胡同裡轉悠，主要是意識形態壁障的緣故。

實際上，國家不僅可以調節市場，還可以調節所有制結構。比如，國家若想使經濟更有效率，可以用經濟手段如降低稅率來調節，加大私人資本比例；如果出於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或其它考慮需要增加國有部分，增稅投資建廠就是。擔心動搖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也大可不必。當然，這可能是改革目標實現以後的事。

確立新民主主義的國體，不僅對人們老是擔心改革開放會出現反復，在政治上是真正的「長效定心丸」，而且可以解除改革「臨戰」姿態。鄧小平是個急性子，如果他不是那麼急，1976年也未必會被打倒，毛澤東的身體眼看不行了，自然過渡多好。「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祇爭朝夕。」在這一點上，他和毛澤東一樣。

現在改革，他還是老脾氣，總想在他生前把改革的一切問題起碼是重大問題都基本解決掉。可能與他這種想法有關係吧，這幾年，尤其前年的「價格闖關」，全國上下都處於一種臨戰姿態，神經高度緊張，感覺好像馬上要打一場淮海戰役似的。這種心態，同和平時期經濟建設的氣氛不相適宜，對處理好改革與發展、改革與社會政治穩定的關係也不利。

市場的形成不是一日之功，所有制結構形成適當比例，也以漸變為宜。——不能採取瓜分國家財產的辦法，急於求成，一蹴而就。就是價格問題，理論上很清楚，實際問題也很突出，解決起來也不一定要用打淮海戰役那種「總體戰」的辦法。新民主主義確立了各種經濟成份合法的平等地位，經濟改革的理論與實踐，大的思路理順了，在維持社會政治

穩定條件下，結合經濟發展的要求，順其自然逐步推進就是。積極的態度是需要的，但急於求成、採取臨戰姿態、神經搞得高度緊張，則大可不必。

改革確實是場深刻的變革，但把它稱為革命，則不合適，有點過甚其詞。在我們的「革命拜物教」觀念裡，革命總是一個好名詞。把改革說成革命，可能是想提高改革的地位，「上綱」上得高一點。但是，如果我們不是指「綠色革命」、「信息革命」那樣的「革命」，而是從「革命」的本來意義即政治意義上來理解，卻大大不然呢，那往往和動亂、內戰、流血之類可怕的事情聯繫在一起的。共產黨已經掌握了政權，要做什麼事，完全可以用政府權力推行某種政策來實現，為什麼非得還要「革命」呢？其實這也是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觀念，不過這種思想遺產卻並不可取。

改革，無疑應該採取改良的漸變方式，其實，說「和平演變」也許更貼切一些。祇是有些人一聽到這個名詞，可能會神經緊張，說起來，「和平演變」這個詞，也應該「平反昭雪」呢。為強調改革，就把它說成革命，對改革採取臨戰姿態，搞得太急，激起社會動盪，釀成政治危機，不僅欲速不達，革命不成，說不定反而搞出「反革命暴亂」來呢。價格闖關和「6.4」以來，改革出現停頓反復的教訓，值得深思。如果每年都來個「6.4」，共產黨老本再雄厚，怕也經不起如此折騰，不僅改革失敗，甚至要連這個國家也賠進去了。當然，共產黨也不會那麼蠢，碰了壁，會學聰明的。

綜合世界情況來看，社會主義受挫，國際共運退潮，客觀情勢如此。東歐國家的共產黨，紛紛退回到社會民主黨了，是不是現在「退一步」，將來「進兩步」，先不去論它，反正現在是在退。這大概也有點規律吧，不然何以都如此，大的歷史現象，恐怕不能用一兩個人的「叛變」來解

釋，這不符合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

按照我們過去的歷史觀來看，中國的改革，說是前進，其實也是在退。社會主義繼續前進，應該走向共產主義，即使一下子達不到，也該是向著那個方向變化才是，怎麼搞出些個家庭經營的農民、個體工商戶和私人企業來了呢？這些都是前已有之的東西嘛。但是，中國以及東方的共產黨，在歷史上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傳統，因此，我們退回新民主主義，是合乎邏輯的。

中國歷史上經濟科學並不發達，幾乎沒有值得一提的經濟學家，毛澤東對經濟也不大在行。但是，他的新民主主義卻有明確的經濟綱領，雖然粗略，作為「綱」，卻夠了。而且，毛澤東論述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和鄧小平推行的經濟改革優先戰略，暗中相合相通，有異曲同工之妙。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即所有制結構，給經濟改革的理論提供了一個可以作為基礎的「綱」；改革以來，對諸如計劃市場一類理論探索的成果則可以視為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的完善和發展，充實了許多「目」。

經濟改革如此，政治改革的基本路數也可以在新民主主義的「共產黨領導的四大革命階級聯合專政」「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這樣一些論述中找到歷史延續的共同語言。這個情況，或許是出於歷史的偶然巧合吧，但現在對我們卻很有利。

實際上，現在我們恢復新民主主義的國體，真正的作用，不過「正名」而已，並不意味著中國改革要來個什麼大轉彎，改革的路線和戰略可以順勢而延續下去，祇會更有條理，搞的更好，而不會引起政治上什麼大震動。如果我們從傳統文化的「中庸之道」中有所領悟，發揮一下中國人的想

像力，使事情的變化更加婉轉、緩和、自然，作為過渡，我們祇要說一句話：鄧小平、趙紫陽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實際上就是「新民主主義論」，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國體，對於中國，已經是呼之欲出了。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更多地注重「人道」、「民主」這些名堂，一般缺少明確的經濟綱領，這和現在蘇聯東歐的改革戰略相一致。他們如何搞，我們弄不清楚，也顧不著了。

中國恢復新民主主義的國體，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作用，是有利於實現祖國統一。眼下兩岸交流，漸成大潮，雖然有人對當世界公民有興趣，以百年千年計，世界大同或許是歷史趨勢，但現實的趨勢卻是，血仍然濃於水。

當今世界，「雅爾塔體制」崩潰，日本、德國重新崛起，世界進入多極。大國爭霸，群雄競起，主要領域是經濟。世人將中國算作一極，其實卻力有不及，如果加上臺灣、香港，份量就大一些了。

此情此景，我們何苦再兄弟相煎、同室操戈呢？什麼新舊三民主義的區分、「聯俄」之類「三大政策」的差別，這些幾十年前的老皇曆，今天已沒有什麼意義了。改革以來，中國的「實」已有變化，如果再正了「名」，那麼按毛澤東當年的說法：所謂「新民主主義」，其實就是「新三民主義」。這樣，在意識形態上，也就沒有什麼對抗的色彩了，自然對祖國統一有利。剩下的問題，其實也不過是執政者的一點面子而已了。

因此真正重要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際進展，和臺灣方面對兩岸關係如何處理。臺灣這幾十年臥薪嚐膽，痛定思改，振作精神，慘淡經營，經濟上幹的很出色，足稱世界楷模。現在如果不把興趣放在唱反共老調、唸「6.4」文章、派個特務搞點小名堂，而是著眼與大陸經濟合作的大手筆，將來在統一中國的政權裡佔有更多的份額，是順理成章的

事。從歷史角度看，這也是小事，若能由此推動實現祖國統一，於民族大義，則功德無量矣。我們應該學習德國人，統一先從經濟上做起。

毛澤東搞了幾十年「階級鬥爭為綱」，鄧小平不搞了，他的說法是：階級沒有了，綱也不要了，但階級鬥爭還有。恢復新民主主義論以後，沒有階級鬥爭的說法，站不住腳了，是否要恢復階級鬥爭呢？也不必。當然，有階級，就有矛盾，有鬥爭，但解決階級矛盾，並不一定都要用鬥爭的方法；階級鬥爭，也不一定要採取對抗的方式；即使對抗，也要有點規矩，限制在一定的軌道內，不必發展到你死我活的階級戰爭的地步。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這是對的，但國家既已產生，它的作用，也不僅是抵禦侵略和鎮壓反抗，在統治階級內部，也有調整階級關係、調和階級矛盾、控制階級鬥爭的任務，而不是挑動無休止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國人都知道劉少奇有個「階級鬥爭調和論」，其實這個意思，列寧也講過。為了維持統治秩序、維護社會穩定，對收入懸殊，可以用經濟政策、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來調節階級關係。我們在這裡不用「分配不公」的說法，因為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資本的利潤，應該認為是公平的。

實際上，在中國重新產生的資本主義，因為沒有原來大財閥的基礎，不僅達不到「操縱國計民生」的程度，而且可能會是比較平均、比較民主、帶有所謂「人民資本主義」的色彩。中國有強大的國有經濟，有共產黨進行幾十年階級鬥爭導致的平等觀念，又可以借鑒現代資本主義「資本民主化」的經驗，我們對資本主義，能夠興其利而抑其弊。「季孫之憂，不在顛輿，而在蕭牆之內。」我們主要的擔心，現在並不是不能抑其弊，而在於不能充分地興其利。

一位臺灣回大陸探親的國民黨高官對共產黨的老幹部說：「你們共產黨最大的錯誤，就是不知道捍衛本黨利益。在你們開 13 大前後，國民黨也在開 13 大，你們開會，不掛毛澤東的像了，可國民黨開會，仍然掛孫中山、蔣介石、蔣經國三個人的像。毛澤東那麼大的功勞，文化大革命搞錯了，你們就批判他。蔣介石的錯誤，要大的多，把整個中國都丟了，我們國民黨也沒有批判他。」這一通議論，對我們真有點驚世駭俗。這裡包含著國共兩黨價值觀的複雜內涵，我們不去分析了。不過有一個道理卻是對的：毛澤東是我們的國父，毛澤東的旗幟不能丟。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評價，也還客觀，比赫魯曉夫對斯大林，處理得好。鄧小平講四個堅持，還有堅持毛澤東思想呢。

蘇曉康在《河殤》裡反思了中國的五千年歷史，認為共產黨背離了五四運動科學與民主的傳統，這個說法或許有道理；共產黨和毛澤東可能對科學與民主的問題解決得不好，但解決了比科學與民主更大的問題，這就是反帝反封建，趕跑了帝國主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掃蕩了封建主義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勢力。倘若不是如此，有些人稱讚備至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仍然都會是些洋人而已。往好處說，不過請麥克阿瑟和克萊將軍來搞就是了，中國人何必再搞什麼理論，研究什麼社會科學呢？把別人的瘡疤作為值得炫耀的東西，恐怕日本人和德國人心裡也不敢苟同，好像我們中國人倒霉倒得還不夠，還要在「二戰」後弄個戰敗國、把世界上所有倒霉的事都搞到自己頭上才覺得過癮似的。況且，當初標榜「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洋人，卻同中國反動的封建經濟關係、和那些老地主們搞在一起。這個問題，國民黨和蔣介石沒有解決，共產黨和毛澤東解決了。這位臺灣的國民黨人，身在局外，對歷史的大的輪廓，可能看得反而清楚些。毛澤東建立的功業是不朽的，科學與民主

的問題解決得不好，可以繼續解決，不然要後人幹什麼？

當然，毛澤東文化大革命搞錯了，1958年也搞的不好，還有什麼反右派、彭德懷等等，實際上，黨的歷史問題決議作出肯定評價的所謂「三大改造」也是站不住腳的。不然為何現在又回去了呢？這可能也是13大政治報告沒有恢復新民主主義而採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說法的原因吧。實際上，論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內容，和新民主主義是差不多的。總的說，整個社會主義革命都搞的不大好。儘管如此，除了建國以後還有許多實際的貢獻不論，毛澤東還有《新民主主義論》。鄧小平講四個堅持包括毛澤東思想，是有先見之明的。

可是，他講的毛澤東思想，卻使人有點糊塗：毛澤東思想是黨和人民集體智慧的結晶，這種說法也可以成立。不過，把凡是正確的思想，即使是別人的思想，也算在裡頭；凡是錯了的，毛澤東自己的思想，卻不放進去，這樣講，使人覺得彘扭、難以接受。實際上，毛澤東思想，按毛澤東本人的說法，應該一分為二，大體上可以分成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是正確的。後一個階段，即社會主義革命，包括文化革命、大躍進、公社化，以至三大改造，錯了，也搞得不好。我們今天講堅持毛澤東思想，就是堅持毛澤東的正確思想，而不是堅持他的錯誤思想，如果不是這樣，連他的錯誤思想也一起堅持的話，難道我們要再來一次文化革命，再搞一番大躍進和公社化，或者再進行一次「三大改造」嗎？

所以，我們今天講堅持毛澤東思想，就是要堅持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思想，舉毛澤東的旗，就是舉新民主主義的旗。這不僅是繼承共產黨的革命傳統，而且也是現實的需要，可以說是真正做到了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和中國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則是在糾正了毛澤東

的錯誤思想和實踐之後，發展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正確思想。這樣的說法，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民也不會再鬧什麼信仰危機了，所謂信仰危機，實際上是理論脫離實際，講的不對，不能說服人，把人們的思想搞糊塗了。

正如馬克思說的：「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祇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祇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改革需要理論，但這個理論，必須是正確的理論，徹底的理論，清楚明白的理論，能說服人的理論，祇有這樣的理論，才能說服群眾，掌握群眾，從而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推動中國改革的前進。

改革搞了十年，倒退到 40 年前，改到新民主主義去了，鄧小平會不會認為這是貶低他的改革開放呢？而且，這不僅是鄧小平的面子，還有共產黨的面子。幾年前才作了歷史問題決議，現在三大改造又要否定，豈不造成思想混亂？這是政治考慮。

但是，面子應該服從真理，理論不正確，不徹底，不能說服人，才真正會造成思想混亂。兜圈子、繞彎子、顧面子的理論是要不得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對歷史的貢獻，是客觀存在。領袖在世，人為地拔高，沒有用，毛澤東看破紅塵，什麼四個偉大、三個副詞，也是當作政治鬥爭的工具而已，用得著時，由你說去，用不著了，「討嫌」！人死了，他的歷史功績，也抹殺不了，靠挖祖墳，不能建立威信，終將為歷史和人民所不齒。

鄧小平的歷史評價，儘管「6.4」抹了黑，但十年改革開放的功績，人民不會忘記；他為中國開闢的改革之路，將載入史冊。對這些，可能倒是旁觀者清，當局者還是想開點好。

當然，政治是複雜的，要考慮現實。中國人民對新民主主義，已經很陌生了，轉這個彎子，須費些周折，不過，那是時機和策略方面的問題。

毋庸諱言，中國改革有阻力。就領導層而言，主要是元老派和中顧委，他們代表著大批老幹部，這批人對中國政局的影響非同小可。

他們為中國革命流過血，立過功，建設時期，清貧廉潔，埋頭拉車，是共和國的支柱；文化革命挨過批鬥，政治運動歷經坎坷；改革開放時，被一刀切，離休了，觀念是老的，這很自然；這些年，除了房子好一點，生活待遇是下降的；改革開放，是別人幹的，腐敗官倒，與他們無涉；沒有權了，他們的不滿情緒強烈，而且頗有影響。他們的基本思想傾向，是懷念當年，留戀毛澤東時代。

他們可以輕而易舉地顛覆地方政權，在中央，鄧小平也得和他們周旋、讓步、妥協。胡耀邦、趙紫陽的傾覆，都有他們的因素。「6.4」之後改革停頓反復，主要是他們的影響所致。

這是在中國改革前途頭上懸著的達摩克里斯之劍。

鄧小平推行改革，為了對付這批人，費了不少心機。但他採取的辦法，基本上是重組織、輕政治，重行政、輕思想，不重視用理論做統一思想的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中國改革的局面，是鄧小平壓制了這批老幹部的意見取得的，這裡談不上什麼黨內民主。這種搞法，好的方面，是十年之內推進改革迅猛發展，已成不可挽回之勢。潛在的危機是：「6.4」之後，黨內與社會的不滿矛頭集中在鄧；設想一下，鄧之後，不滿情緒迸發，青年學生打衝鋒，大轟大鬧，這批人在後面支持，執政者頂不住，政權落入他們手

中，伊朗的情況就是如此。當然，改革之勢已成，倒回去也不可能，但反復折騰，損失就大了。

鄧小平應對百年之後的隱患，他安排後事的打算，是解散中顧委、消除老人干政的渠道，其著眼點，仍是組織手段、行政措施。為中國改革前途計，也為鄧小平計，如果在組織和行政措施之外，再加政治和思想的統一工作，採取組織行政與政治思想並重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效果就會好得多。

統一全黨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需要的理論武器，還是新民主主義。道理很簡單，這批黨的老幹部，他們不是留戀毛澤東嗎？新民主主義也是毛澤東思想，而且是毛澤東的傑作。他們不是懷念當年嗎？新民主主義也是他們革命生涯的部分，而且是最光輝的一部分。在政治觀念與思想感情上，資本主義和西方的東西，他們很難接受；而新民主主義，是他們曾經十分熟悉、也相當親切的東西，他們接受起來會容易得多。當然，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資本主義實際上也就有了一席之地。如果把道理講正確、講徹底、講清楚，相信他們的多數，是能夠接受的。變革時代，會出現許多新的問題，具體的疑慮、不滿，還會有不少，但是「綱」接受了，大問題就解決了，「綱舉目張」，剩下的事情慢慢做就是。這樣，改革的阻力和出現大的反復的危險，大體上可以消除，甚至這批老幹部還可能成為改革路線得以延續的組織保障因素。在鄧小平之後，有一段時間屬於他們，這一段，很重要。

當然，對鄧小平來說，接受新民主主義並用來統一全黨思想，意味著要更多地否定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時期，如「三大改造」；這同時也意味著要否定他自己的一些東西，如他主持的中蘇大論戰。不過，鄧小平的歷史地位並不建立在那裡，這一點，他會清楚的。如果鄧小平和老幹部們能在有生

之年完成這件事，將是他們對中國改革事業的最後貢獻，後代人也會更加尊敬他們的，他們的餘熱，應該在這裡發揮。

新民主主義祇是一個粗略的「綱」，還有許多問題，例如共產黨的性質、綱領等，這裡不談了，留給中國的意識形態專家們去搞吧。國家養活了一大批人，他們吃了飯，也總得有點事情幹才是。

當然，如果鄧小平來不及去做，或者不願接受新民主主義的提法，後代人也會有人去做的。事實是頑強的，真理是樸素的，符合歷史規律的事物，終將為人民和這個黨所認識、所接受，誰也阻擋不了，不過歷史多一點曲折就是了。

中國的改革正在困境的旋渦掙扎，「6.4」的陰影使全國上下陷入沉悶，但是，正如毛澤東愛說的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對中國改革的長途，不應當悲觀。「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在新民主主義的旗幟下，中國改革完全可以更順利、更成功。